

(据宁夏党史教育)

1936年,美国友人埃德加·斯诺

有一天清晨，斯诺在豫旺南门外拍摄操练的红军小号手，这些战士都仅有十四五岁。斯诺调整着镜头，总感觉有些不满意。忽然，他眼前一亮，看到一位身穿新军装，个头高挑，年轻英俊的红军战士正与战友们畅谈战术的情景。这正是19岁的基督教导师谢立金，当时他已是“老”红军了，他14岁在江西当红军，参加了长征，红军西征又来到预旺。斯诺走了过去，看到身着新军装，体格健壮，背着手枪的谢立金，觉得终于找到苦苦寻觅的理想号手。斯诺问他会不会吹号，谢立金说：“我刚参加红军时就是小号手。”斯诺高兴地请他走上豫

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

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一年，毛泽东说：“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，没有油吃，没有纸，没有菜，战士没有鞋袜，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。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，企图把我们困死，我们的困难真是太大了。”

为了解燃眉之急，边区政府只能采取加征救国公粮的办法。但沉重的财政负担，很快引起了民怨。如何克服困难呢？办法有两个：一是做减法，减征公粮（1942年的公粮由原定的19万石降为16万石），精兵简政（减少脱产人员数量），减轻农民负担；二是做加法，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，增加农业产出。由此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。

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,毛泽东作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》报告时指出,“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,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物质福利。”在大生产运动中,边区农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,按照不同情况,确定了“耕一余一”“耕二余一”“耕三余一”的粮食生产计划,普遍成立耕种变工队,草草扎工队。除种好原有耕地外,还鼓励农民积极开垦荒地,开展生产竞赛,踊跃交粮、交草,参与运盐、纺纱、兴修水利,为军烈属代耕等活动。在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同时,中共中央进一步完善以减租减息为核心的租佃制度改革,有效调动了乡村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。在减租过程中,边区各地通过乡村户会、减租会等民众组织,专门负责处理减租和保护事宜。

经过两年左右的艰苦奋斗,基本实现了自力更生、丰衣足食,全区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。1943年,延安市东区黄蒿岭村民曹守富说:“过去吃的是高粱、稀米汤,现在已经为白米、白干米饭所代替了。端午节全家聚餐,吃着鸡肉酒菜。”

给农业生产做好加法

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,不仅取决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而且取决于耕作技术、良种推广、生产组织形式、生产资金等要素。大部分地区的地方耕作方式相当粗放。为达到“耕二条一务,边区政府要求普遍推广耕作技术,以提高作物产量。各地农民过去种地基本不施肥,经政府提倡后,各地更增加了,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施粪。农民采用各种方法增加肥料:牲畜垫圈粪,多建厕所勤拾粪,拔柴草,控炕灰和垃圾,上

发放农贷支持农村经济发展,是边区金融工作的首要任务。1941年12月15日,根据陕甘宁边区银行提议,边区政府成立农贷委员会,以李鼎铭、高自立等7人为委员。随后,各分区成立农贷委员会或办事处。1942年1月,边区政府制定《边区农贷的基本任务和目前的实施办法》。1943年初,根据边区银行结合实际情况先后制定《三十二年度(1943)农贷法》《农贷小组暂行组织办法》《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办法》,将边区农贷分为生产、副业、供销、农田水利四类。农贷年息1分,短期月息1厘,以一年为期。1942年,边区种植棉贷款96万余元,使边区棉花面积扩大了一倍,棉产量上升到140万斤。青苗贷款是为解决农作物生长期间生产资金困难,打击高利贷活动而设置的。据年报表,边区银行在延安县、延川县、延长县,共发放棉花青苗贷款100万余元,折合棉花11989斤。农田水利贷款一般由边区银行发放,银行协助。1945年至1946年春,边区政府在延安、延长县水利贷款600万元,新修水地316亩,补修水地609亩,折合粮食30余石。

在利用和改造各种民间劳动互助形式，组织群众发展手工业、运输业的同时，也使旧的劳动互助组织具备了深刻变革，奖励劳动，打破了小农经济的一个限制——分散劳动。1943年11月29日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边区工作会议上号召，“把群众中的组织起来，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、一切学校的力量、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，只要能够劳动，都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，组织起来，成为一支劳动大军。边区各地普遍流行扎工、变工、锣鼓班子等劳动互助形式，上升了劳动生产率。”

给乡村社会一个新面貌

为建设模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,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革除陋俗恶习,并通过宣传新风尚,刷新民众精神世界,正村的社会面貌。

改造闲散人员，是从延安县开始的一场群众运动。据建设厅调查，1937年前，延安市人口不到3000人，而流徙500人；延安县人口为3万左右，流氓、地痞为1692人；该县的情况与延安大致相似。1940年春，延安县在庙沟乡成立动员队，提出让闲散人员参加生产。到1941年底，延安县闲散人员减少了72%。延安县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，赞：“延安县同志们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。”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改造闲散人员》，积极推广延安县的经验。3月4日至5日，中央生产委员会在延安召开开会、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，朱德指示：“在生产中，不许有懒子、一个闲散人员。”至此，陕甘宁边区改造闲散人员运动经过各方面的努力，改造闲散人员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，有力地巩固了社会安定。

吸食鸦片是旧社会给陕甘宁边区民众造成的恶习，经济建设和社会风气。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绝烟草的主要做法，查禁和发动民众监督等，主要做法是禁绝种植，严查贩卖、改造嗜好鸦片者。为查禁及处理边区境内烟毒犯罪行为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，后来又由重要城镇罪首分处。1943年9月11日，边区政府发出《为禁绝吸毒事》，各县(市)政府的指示信》，对帮助烟民戒烟提出了具体要求，群众性的戒烟运动，发动烟民进行戒烟竞赛。至抗战胜利鸦片者近乎绝迹。

模范村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新生事物。模范村延安县开始的。陕甘宁边区第一个模范村,就是延安县东乡的吴家枣园村。1943年11月,西北局招待劳动英雄“劳动英雄要成为团结和推动一个村一个乡群众生产旗帜。”劳动英雄吴满有率先响应毛泽东“组织起来”号召,将吴家枣园村的模范生产经验,推广到整个延安二乡,使其成为模范乡。受此启发,更多的劳动英雄准备将个人的生产经验扩大到全村使其成为模范村。边区模范村建设进入高峰,涌现出生产模范村、文化模范村、运盐模范村、纺织模范村等。模范村建设在大生产运动继续向深入发展,而且对农村社会改造及的作用也十分突出。

(据《中国组织人事报》)